

姚建业

系国文选

远方出版社

一弓月文集

远方出版社

· 红蔷薇文丛 · · 一弓月 ·

姚建业 著

* * *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乌兰察布市曙光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625 字数:151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1—3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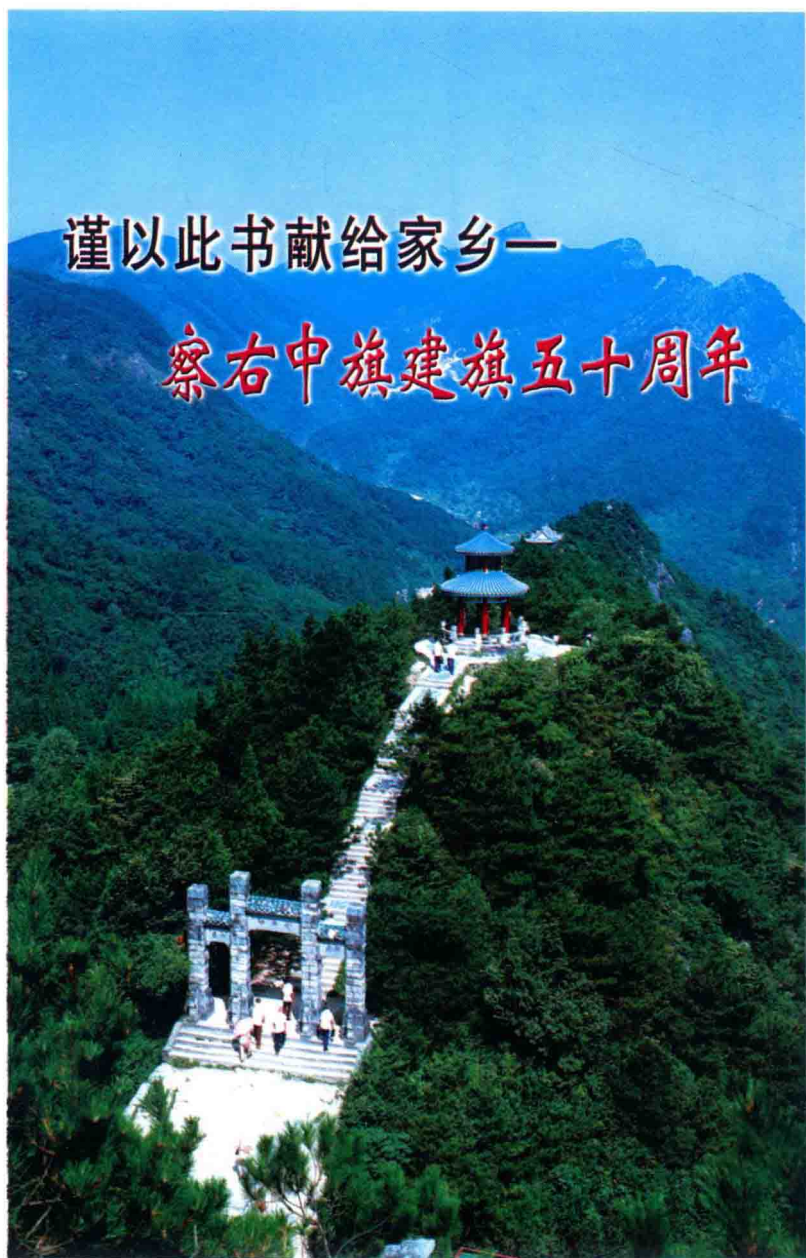
ISBN7—80595—859—9/I·270 定价:20.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家乡——

察右中旗建旗五十周年



幻释于历史风烟中的图腾崇拜(代序)

——读姚建业《姓》随想

马明奎

“散文体小说”不简单地是一个体裁定位,而且在权威教课书的体裁类型中也没有“散文体小说”这一体式。我在想:姚老师肯定是以非常严刻的自律要求他的小说创作——作为一种可以虚构,甚至是以虚构为标志的艺术建构中凝结最为真实的、犹如散文那样的材料真实性和历史客观性。真而且实,而不是什么艺术的真实;换言之,在将艺术作为一种生命和存在方式、甚至是最高方式来追求的人生旅程中,姚老师仍然有志于把握那些客观有效的真实性和深刻不伪的价值点,而不是自欺欺人式的瞒和骗——这可能是姚老师“散文体小说”的根本艺术旨趣。

我读罢他的《姓》之后最强烈地感到这一点。材料的真实可考,语言的方言实录,心理和情感的石破天惊……构成这部小说巨大的文化历史含量和强烈的艺术形象力量。

小说采用的是一种纯叙述,而且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纯叙述就会有太多的空档留给读者,使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来解读作品,而不是发表和表述作者自己的观点或情感;“有点冷冰冰的!”我读书的时候这样想。即使在作者的感情潮汐已经使稿纸上的字迹扭曲的时候,叙述仍然是客观质实的。第一人称就更去除了外“我”超越的阐释追加,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时代话语的或审美想象。某种意义讲,这种向着叙述的“还原性”努力,使小说具有了非常强烈的当代性和前卫性。

于是,我不得不回溯着一种历史文献考据式的思路来读这个小说。一九四一年腊月隆冬,察北地区有42名抗日救国会成员被日本侵略者抓往张家口屠杀。另一个资料显示不是42名而是48名,其中只有1名是科布尔镇的一家店铺老板的儿子,请了八家店铺作保而且是通过一名共产党内线的翻译官的操作,才被保释出来。这位公子哥是察北抗日救国会留下来的唯一幸存者,而我本人有幸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见到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终生对日本鬼子有仇,不共戴天。这位老人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受到一次错误审讯,而且是察北某公社专管知识青年回城推荐工作的贫协主任,在此期间认识了很多都市来的年轻人。他认为,他这一生做了两件不后悔的事:一是加入救国会,一是推荐知识青年回城,此当别论。

我是说,姚老师本人的父亲正是死于一九四一年这次劫难,是一名刚骨铮铮的共产党人。这位老共产党人所点燃的不止是一粒共产主义理想的火种,而且是中国文化中用以确立人的人性尊严和价值存在的那点家族伦理的观念和种族体认的血性。这点点滴滴血性在民族遭劫的特定年月,就成为一代优秀中国人奔走赴死、呼号图存的根本人性内驱。小说就是从父亲周培烈被日本鬼子抓走牺牲写起。然后就是母亲陈英在失去任何怙恃之下,为着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的生存,为着周氏家族的血脉传承而血泪奔涌、流离颠沛的苦难人生经历。周根心这个人物,也就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传人,而且是一个民族的尊严和一个人的存在价值的象征。这是一部血泪史,但更是一部中华民族孤苦图存的奋斗史。它显示:在这个民族的生存发生危机的时刻,正是这一脉不绝的血缘、这一点不泯的血性,作为最后的、也是最高的价值支撑,支撑着一个女人和一家孩子活着,尽管不断地死亡,不断地付出血泪,但是她们仍然顽强地活着,存在着。小说没有把共产主义理念从血缘体认和人

性尊严的信念中剥离,而是悄悄地淡去,沉淀,几至于无——直到社会历史已经完全不须血缘、不必家族的支撑人也可以活下去的今天中国。我特别注意到“火烧泉子村”这一历史事件。这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制造的无数个血腥事件中的一件,发生于一九四二年的腊月,整个中华民族处于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刻。盘踞于京绥线要塞旗下营镇的日本鬼子,得悉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两名干部李忠义和高鸿森藏身陶林县窑子村(又称泉子沟村),于是包抄抓捕,把全村老百姓围堵起来,逼问藏址。就像那些抗日题材的故事片演示的一样,全村没有一个人屈服,日本鬼子恼羞成怒,杀死二十三人,败兴而去。窑子村人讲,当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他们认定李、高是两个好人,是八路军的人,而八路军就是一些好人。窑子村没有一个人做卑鄙下贱、出卖好人的人,所以他们宁死不供。据说直到第二年亦即一九四三年的秋天,路过窑子村时还能闻到日本鬼子焚毁尸体的臭味,可见凶残之至。在读《姓》的时候我就想:不做卑鄙下贱的人——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人格理念,它是如何支持一个村的人民不惧死亡而赴义的英雄壮举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正是来自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最高价值理念。血缘体认的意义在于“人这东西不仅仅是一个个体存在,而是服膺天命、担当道义、承荷着家族乃至众生的伦理主体。血缘体认的根本价值理念正是来缘于此种整体民族图生存的抗争决心。而最初的共产主义者正是有效地点燃这一理念和决心,使这个古老民族重新爆发出生的呼号和死的行动。

时代发展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民已经从侵略者的蹂躏下解放出来。周根心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名优秀中学生。这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年月,共和国如日初升。但是对于周根心,环绕着他的生存环境还是充满宗法家族观念,而他的内心深处却也正是根深蒂固的血缘体认情结。姐夫贺子华、二姐夫李道成、继父米贵、

乃至那些偶有瓜葛的各色人等，无不执持着宗法观念的阴影看待自己的家庭关系和处理与周根心的亲戚关系；关爱，那种更广博一点的，属于人类的爱意，被非我种姓之类的心理阴影遮蔽着，稀释着，直至淡冷。而死去的二姐，一直收养着周根心成长的大姐，包括已然没有任何能力关照儿子的陈英老人，也都无不是从血缘种姓这一理念去监护周根心的成长。他们都把周根心作为一个姓氏传人而不是活生生的孩子来对待和要求。这里形成深刻的、血缘种性与活泼人性之间的疏离和对抗。爱，情爱或友爱也正是在这一心理分岔上滋孽起来。令人感触良深的是周根心一直深爱着的学姐林梦梅——也是从姐弟关系开始缔结着他们的深深至爱。爱情与血缘亲情就这样奇妙地嫁接起来。血缘，已经不再是生物自然种属标志，而是一种图腾，一种最高信仰。那么此种亲情性质的同学之爱滋长湮漫起来的最高价值型态又可能是什么呢？于是出现了犹如贾宝玉所处身的大观园那样一个童年梦幻式的成长环境。这是继“火烧窑子村”事件中中国人民铁血刚骨的人格尊严和生存意志之后的第二个情感潮头。也正是在这里，小说巧妙地插入周根心被处分团内警告的政治事件。这是共产主义理念与血缘亲情幻影的男女情爱的第一次疏离。周根心在交心会上的委屈和折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为了一个少年特有的尊严和荣誉，他接受了这种心灵的折辱。更为奇妙的是，团支书不但不藏有嫉妒，而是因为周根心的改悔而改变了看法，再度表扬和认可了他的团员资格。这不仅与亲情血缘完全没有关系，相反，是以涤除此种关系为前提的一种超越的、没有人性内容的组织“教育”方式。在情爱与血缘意趣之间，横插进一个第三者。我们不难体味：这个没有人性内容的至高者，仍然是一个大家庭，一个以种姓为内容的集体——这个种姓不是张王李赵，而是共产主义。加入组织的人就变成了与血缘事实和男女情爱没有现实联系的特殊人。那么，这个

种姓在支撑什么呢？

如果说在那个风烟弥漫的年月，家族种姓确实支撑了一个家族的传承和繁衍的话，那么此时此地的这个种姓就不再以此为目的，而是以此为对象了。失去个我存在价值的超越种姓不以情爱和血缘为基础，是一个没有支撑内容而只有处分对象的集体权力意志集合体。人在这一意志面前没有任何权力和地位。于是另一个基本人性支撑就悄然或居然滋孽起来，这就是性。街道里以性为游戏的孩子们，对男性有奇趣的班花，还有对女性实施性玩弄的白老师，这些人有意或无意地对性感兴趣，生发出或美或丑的人性之花。无独有偶，在这一人性价值滋长的周边就是玩性成瘾、自得其乐的李道成——性成为李道成整体人生价值的最高成就。时代发展到今天：某单位领导的性受贿，弥天漫地的性狂热，直至周根心本人在作评委期间接受性服务——“性”终于替代了“姓”而成为制导今天人类的绝对心理内驱。在“性”的诱惑下，伦理、年龄、社会身份以及神圣社会职责……都失却神圣的光环，成为一些副产品。换言之，由于有了性的权利和享受，这些在过去时代是作为人的社会存在价值的东西才有了真实的含义。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从大姐周金枝的立场看，周根心后来的社会价值实现恰恰是以取消她所期待的种姓道德和伦理精神为前提——从种姓伦理的角度如何解释一个据有社会地位的名人对于一个卖身女孩的肉体贪欲呢？不仅种姓伦理不能解释，恐怕是连共产主义理想也不能解释。家庭伦理和血缘体认在人的欲望和贪求面前苍白了。

如果说种姓伦理所滋育的存在理念的确铸就了周根心顽强的人格精神，成为那个时代里的价值和尊严的源泉的话，那么几乎与此同在的自然人性欲求很早就开始腐蚀着和浇灭着这种价值和尊严了。小说第一节奏呈现了三个物：一是受到革命家庭的熏染却作了汉奸的陈拴牢，二是成长于有着抗争精神和民族尊严的泉

子村的米大虎和雷祯平,前者一人二妻,后者二人共妻,他们在家族伦理森严的年月就实施了性解放并且玩弄性交换。他们把性滋孽为人的沦丧或堕落,使人成为非人。而今天的社会,又在另一个意义上重新培植着这种非人的人性价值。陈拴牢和米雷二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任何社会理念,只有自然人性欲望。今天的社会,或者把传统社会理念蚀空或者完全忘失,裸显给世人的唯一价值就是性。就像雷祯平和米大虎以享有几个老婆为最高人生价值去追求一样,官、民、名流、显贵,无不以享受和玩弄性作为真实的个体人生价值去追求,其它都是附丽于此的。我们可以仅仅以堕落和腐败来解释这一切吗?我们从周恨心夜半出行与如玉姑娘的性交换看到某种沉痛:性的泛滥中有着人的灵魂的空洞的黯默和舐伤的抚慰!

地道彻底的方言叙述是《姓》的第二根本特点,我想,这也是统一于真实客观的价值把持的根本艺术旨趣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物语言的性格化甚至地域化,也不是锤炼劳动人民的语言使之成为表现力更强的艺术语言,而是艺术本体的地域化和叙述本身的方言化。这大大限制了小说的传播范围和解读可能。我甚至觉得姚老师有一个从过去散文语言的优美雅健向着今天的方言质实的整体审美风格的回落。这不是一个小的问题。任何语言都不只是一种表达工具,而就是存在本身。《姓》的语言努力不仅向着地域幅度,也是向着历史深度和人性维度的。这就加重了小说作为文献资料的民俗化和人类化趣向,使得我们不敢擅自从艺术角度去解读它。我由此想到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价值理念,还是存在方式和语言方式,都有着一种返朴归真的趋向,冒昧一点说,就是一种精神白矮化。一个绅士风度和贵族精神的知识分子,却往往会沿着耕读传家的路子走向历史,走向一个老农的精神状态中去,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所谓自然质朴就是去掉任何文化雕

饰，回落到赤子，回落到农民式的家长理短。陶渊明是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一位。陶渊明的归隐不完全是对于社会政治的鄙弃，尤其有着深挚不昧的田园自然的欣悦和乱离逃生，回归家园的安逸。但这还是不够的，比起老子的婴儿和庄子的混沌来，陶渊明的愤愤不平是非常明显的。我的姚老师又是如何呢？

艺术毕竟是艺术。我还不至也不能昏聩到把小说当作文献，把周根心认定为姚师本人。针对读者的探隐心理，我有必要对我的姚师作一点介绍，当然这不会离开小说很远。

我的最初的共产主义教育始自姚师。但这不是缘自他的说教，而是缘自他的人格和教风。一个对于学生和普通人民有着深挚感情的共产党人，姚师的严格卓厉和纯善挚爱是从他的上课乃至对待学生的每一个细节表现出来的。学生怕他，不是因为他凶，而是因为他正，因为他严，因为他处处关心学生。一个叫做李为民的地主出身的学生，因为出身的缘故受到同学欺视因而精神压抑最深，姚师不仅对他平等看待，而且关爱有加，姚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讲出身，不唯出身论，重在政治表现。”言外之义是：李为民同学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是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不错，大家不要欺视他。在那个贫寒的年月，姚师自己的生活都清贫无着，但他给没饭吃的学生拿馒头，拿被褥，带领学生学习、劳动，而且实施着严格的管理和教育。我想不出在那个时候姚老师还有什么更有效的关爱学生的方式！他的这种对于弱者和普通人民的深挚之爱一直坚持到今天的时代。他的家里，他和我们的师母已经养过、现在还在养着几个残疾弱智，不是积德行善一类的传统德行，而是一种怜惜和支持。而作为一校之长的他，对于老师、对于职责乃至对于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的虔心、敬业和诚敬之心，是人所周知的。说简单了，姚师的处人之道就是一点：自己吃亏，为了最大程度地让别人好。这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哲学和方式。

他的另一面就是对于腐败、对于邪恶、对于无耻的深恶痛绝。他把来校检查的上级干部的麻将摊子掀翻，他不参与任何无聊无耻的行为，他把一个学校管理成一个享誉地区的名校却断然离休，不恋厥位。连他惹怒过的人都打心眼儿里说他好，而不是奉称他。可是老师对世道人心无能为力，他的忧伤是深刻的。他的一句最让我们震惊的话是：“一粒砂子就是一片荒漠，一片荒漠就是一粒砂子。现在，让我们沉默下去吧！”像姚师这样的人，刚骨铮铮，古道热肠，清正廉明，又深挚隽永，如果他对于社会历史的反思有着如此沉痛的情怀，我们真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或应该发生什么！我理解姚师的这种人格的精神既与共产主义的终极理念有关，更与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有关，而关键的还不能忘掉他那片赤子之心，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良心，热心、诚心，善心，一副对于天理良知的感念之心。现实中的人好多都忘失了或从未醒觉了这颗赤子之心，所以姚师注定是孤独的。这不意味着他缺乏地位、名誉和周边人们的赞美。而是——他眼睁睁地看着他执持的终极理念正在式微。姚师的忧伤是君子的忧伤，不是小人的得失计较。

在这样一个参照之下，就不难发现姚师的《姓》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抽象出来的象征结构。这个结构式是：血缘种姓——社会理性——自然人性。血缘种姓包含了苦难岁月中人的价值执持，那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家族、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和生存意志；社会理性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情爱，一是血缘亲情，而根本制约着此二者的是最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自然人性是在前二者作为人的内在价值体系坍塌之后从人性腐败中滋孽起来的，却蔚然成势，势不可挡。某种意义讲，时代和社会所赖以维持的人心——已经湮没于人的自然欲求之中而一无可言了。这自然令人想起邓小平同志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理论。在自然人性欲求的洪流大浪中，社也好资也罢，都失掉了应有的色彩，变成一种人的玩弄和亵渎，人究竟

怎么了？

回到语言。如前所述，姚师的方言化努力不是一种语言风格或审美风格的追求，而是一种本体回归，一种存在本身的回归，比起恶污滥俗的人性自然风光来，即使最最土俗的方言，它也坚硬着作为人的真善美的理性内核，它有人的骨鲠在。我说过，这不是一个小的问题。如果系及今天时髦的全球化浪潮，虽然鲁迅先生有过“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样的著名命题，但是，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正是这些民族的、地域的、特色的、个性的根本上是传统理性的东西，成为全球化的根本阻塞。我们就处于完全不能解释的二难处境中了。最简单的事实是：谁来读？谁会读？谁读了以后又会怎么样？说到底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要不要全球化亦即资本主义化？中国的现代生存如何成为可能？这已远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一个简单的生存事实。

问题回到：从一个个体出发和从一个民族的生存处境出发，甚至从整体人类的价值存在出发来讨论问题，是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的。我所关心的是：那个已经消逝于历史的风烟的种姓崇拜的图腾——它究竟是一钱不值的人性障碍呢？还是可以生发出人性尊严和整体人类理性的价值源泉呢？愈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愈是感觉到姚老师的这种地域化和方言化努力是值得讨论的：如果作为一个人类学或文化学文献，《姓》由专家或学者来解读，可能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标本。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文学作品，一个怀思着人类存在和价值的艺术文本，首先就面临着传播和解读的问题。传将不远则其道不行。对于聆听周杰伦或热衷《大话西游》的当代受众来说，这里的阻塞是异常深刻的。他们不愿介入历史和心理。他们只想自我表现，只想得到钱或女人。

作为姚老师心路里程的一块坚实的碑铭，我还愿讲一些坐而论道的话，以就教于吾师。我以为《姓》的材料性和传记性追求阻

碍了艺术开掘,有些题材显得零碎而没能作更自由的提炼或加工,使得这些材料有敷衍真人真事的感觉。比如中学时代和中师阶段的叙述,有时沉溺于情感而暂时失却与主题的联系,尤其是像有有、林梦梅、还有水灾降临时节的村干部,都不易与主题形成关联或侧应,至少是叙述得太过枯硬瘦崛。而有的性描写诉诸语言,则又失却作品本有的含蕴和深刻,显得表面化和硬化,反而失落了心理本身的丰富性含量。就作品整体而言,抽象化程度很高,但又太过散文化,的确是“散”了点,缺乏严密凝炼的、无懈可击的立体感和完成性。有些意象和结构非常之好,如作为父亲唯一的遗物的怀表以及这块怀表与米贵买给米顺心的西铁城手表的对比;比如米、周以及雷姓的姓氏本身以及雷米换妻与泉子村人民抗日赴死的一谐一庄的对比;比如陈拴牢那十块银元的馈赠与李道成认养根心两种方式的对比,等等,都可以处理得非常精到有趣。吾爱吾师,吾更爱吾师语言表述的方式和状态。有时纯粹叙述的松动可能有助于意象和结构的表达,有利于主题的表现,则未必计较篇幅的限制。第三个节奏有草草了事的感觉,而就历时性整体情节看,线索又繁复了许多,使得中心线索纡回难进,影响了读者的解读程度,给人一种从历史风烟中捞回来的沧桑感和缺失感,这莫不是姚师追求的滞重感和残缺美?

是为读后感,敬奉师尊之前,求教吾师,永远的学生不昧。

(马明奎 2004.10.24 湖州碧潮苑南轩)

目 录

散 文

冬阳(外二则)	15
山石	17
寻梦	19

杂 文

从“吃山谷子”说起	23
武大郎开店乎	27
“明镜高悬”辨	31

小 说

自嘲	38
复活	41
姓(长篇散文体小说)	54

幻释于历史风烟中的图腾崇拜(代序)

——读姚建业《姓》随想

马明奎

“散文体小说”不简单地是一个体裁定位,而且在权威教课书的体裁类型中也没有“散文体小说”这一体式。我在想:姚老师肯定是以非常严刻的自律要求他的小说创作——作为一种可以虚构,甚至是以虚构为标志的艺术建构中凝结最为真实的、犹如散文那样的材料真实性和历史客观性。真而且实,而不是什么艺术的真实;换言之,在将艺术作为一种生命和存在方式、甚至是最高方式来追求的人生旅程中,姚老师仍然有志于把握那些客观有效的真实性和深刻不伪的价值点,而不是自欺欺人式的瞒和骗——这可能是姚老师“散文体小说”的根本艺术旨趣。

我读罢他的《姓》之后最强烈地感到这一点。材料的真实可考,语言的方言实录,心理和情感的石破天惊……构成这部小说巨大的文化历史含量和强烈的艺术形象力量。

小说采用的是一种纯叙述,而且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纯叙述就会有太多的空档留给读者,使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来解读作品,而不是发表和表述作者自己的观点或情感;“有点冷冰冰的!”我读书的时候这样想。即使在作者的感情潮汐已经使稿纸上的字迹扭曲的时候,叙述仍然是客观质实的。第一人称就更去除了外“我”超越的阐释追加,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时代话语的或审美想象。某种意义讲,这种向着叙述的“还原性”努力,使小说具有了非常强烈的当代性和前卫性。

于是,我不得不回溯着一种历史文献考据式的思路来读这本小说。一九四一年腊月隆冬,察北地区有42名抗日救国会成员被日本侵略者抓往张家口屠杀。另一个资料显示不是42名而是48名,其中只有1名是科布尔镇的一家店铺老板的儿子,请了八家店铺作保而且是通过一名共产党内线的翻译官的操作,才被保释出来。这位公子哥是察北抗日救国会留下来的唯一幸存者,而我本人有幸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见到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终生对日本鬼子有仇,不共戴天。这位老人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受到一次错误审讯,而且是察北某公社专管知识青年回城推荐工作的贫协主任,在此期间认识了很多都市来的年轻人。他认为,他这一生做了两件不后悔的事:一是加入救国会,一是推荐知识青年回城,此当别论。

我是说,姚老师本人的父亲正是死于一九四一年这次劫难,是一名刚骨铮铮的共产党人。这位老共产党人所点燃的不止是一粒共产主义理想的火种,而且是中国文化中用以确立人的人性尊严和价值存在的那点家族伦理的观念和种族体认的血性。这点点滴滴血性在民族遭劫的特定年月,就成为一代优秀中国人奔走赴死、呼号图存的根本人性内驱。小说就是从父亲周培烈被日本鬼子抓走牺牲写起。然后就是母亲陈英在失去任何怙恃之下,为着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的生存,为着周氏家族的血脉传承而血泪奔涌、流离颠沛的苦难人生经历。周根心这个人物,也就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传人,而且是一个民族的尊严和一个人的存在价值的象征。这是一部血泪史,但更是一部中华民族孤苦图存的奋斗史。它显示:在这个民族的生存发生危机的时刻,正是这一脉不绝的血缘、这一点不泯的血性,作为最后的、也是最高的价值支撑,支撑着一个女人和一家孩子活着,尽管不断地死亡,不断地付出血泪,但是她们仍然顽强地活着,存在着。小说没有把共产主义理念从血缘体认和人